

保护记者委员会 (CPJ)

摘自《2004 年记者受攻击报告》

亚洲

中国（包括香港）

台湾

（报告英语全文可在网站 www.cpj.org 查阅）

联络资讯：

保护记者委员会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美国纽约市七大道 330 号, 12 楼 (330 Seventh Avenue,
11th floor New York, NY 10001 USA)

电话: 212-465-1004 传真: 212-465-9568

电子邮件: asiaprogram@cpj.org

网站: www.cpj.org

亚洲概况

虽然亚洲的新闻媒体 2004 年在新闻自由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对新闻自由的威胁却在增加。对于该地区来说，2004 年为选举年，诸多国家的公民投票，例如阿富汗进行了和平有序的划时代投票选举，印度 3.7 亿人参与了投票。在这些选举与其它选举中，媒体在传递信息与防止滥用权力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亚洲去年底发生地震与海啸，对印度、斯里兰卡、泰国与印度尼西亚等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损失，给当地新闻工作者报道这两起灾难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受灾最严重且动荡不安的印度尼西亚亚齐省（Aceh Province），当地唯一的日报有许多人员丧生。

整个 2004 年，亚洲新闻工作者不断受到罪犯、政治人物与交战各方的攻击。除了在法庭受到骚扰之外，更为糟糕的是，媒体工作者还得与过时的刑事诽谤法与热衷于以所谓国家安全名义窒息批评声音的政府打交道。包括北朝鲜与缅甸等国，专制统治者严格控制权力与新闻。

在地下游击队组织、腐败官僚与犯罪集团残酷打击并威胁媒体与新闻工作者的孟加拉国，CPJ 掀起了一场反对该国不惩罚犯罪文化的公众活动。在该国不讲法制的西南部库尔纳地区（Khulna），Manik Saha 与 Humayun Kabir 两位经验丰富的新闻工作者与新闻自由活动家受炸弹残酷攻击而丧生。CPJ 在对该国新闻自由的情况进行了长达一周的评估之后，将该国列为全球从事新闻最危险的十个国家之一。

在菲律宾，刺客们对记者进行的血腥报复攻击日益增多。至少八位新闻工作者，其中大多数是农村广播电台的记者

因公被谋杀，因此 2004 年成了菲律宾新闻界自从 1980 年代以来死人最多的一年。该数字仅低于新闻工作者从事战争报道死亡最多的伊拉克。

菲律宾新闻工作者认为，当地暴力增多的主要原因是全国性的法律与秩序崩溃、非法武器的广泛流传以及自从 1986 年民主运动以来虽然 48 位新闻工作者遇害，但却没有一个人被判有罪等严重影响。在 2004 年的几起案子中，受害者在一些偏僻的道路上遭受伏击与枪击。例如广播评论员 Elpidio “Ely” Binoya 就是 6 月在桑托斯将军市（General Santos）郊外被两个骑摩托车的攻击者杀害的。他们追上他之后，从后面连续对他开枪。

在斯里兰卡与尼泊尔，新闻工作者常常被困于国内冲突引起的枪战中。斯里兰卡两位新闻工作者遭受致命枪击，当地新闻工作者说，他们是受到该国泰米尔反叛组织、春季闹分裂的 LTTE 不同派系蓄意攻击的。在尼泊尔，新闻工作者 Dekendra Raj Thapa 被毛派反叛人士绑架并杀害一事充分表明，在毛派控制的农村地区，新闻工作者境况正进一步恶化。

中国记者受到攻击的情况也日益增多，因为他们继续撰写有关地方犯罪与腐败的深度报道，以探测政府的底线。正如 CPJ 去年 8 月特别报道中记录的那样，类似的暴力过去较为少见，但目前却在上升，报道出来的已有数十起案子。一些保险公司将新闻业列为中国第三危险的职业，仅次于警察与采矿业。

但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是逮捕与监禁新闻工作者，这是在这个严格管制媒体的国家历史上，他们一直面临的威胁。当局对新闻工作者采取一种轮流坐监的方式，今年释放几个被监禁的作者与编辑，同时又关押其它新闻工作者。中国在这方面一

直保持不光彩的记录，成为全球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至今受监禁的有 42 人。

中国数起臭名昭著的逮捕事件说明，当局继续不能忍耐独立新闻报道。《南方都市报》编辑人员被监禁表明了官员对积极进取新闻的态度，这家在广州的报纸因报道严重急性呼吸道症侯群（简称非典 SARS）与警察滥用权力而著名。去年 3 月，该报副主编喻华峰与前主编李民英被分别以虚假的腐败为由判刑 12 年与 11 年。

《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研究人员赵岩去年 9 月涉嫌“为境外提供国家秘密”被拘留，给中国国内与国际新闻界传递了又一个令人不安的信息。

香港的新闻界在 2004 年也受到挫败。受北京支持的候选人在当地立法选举中轻易获胜后，三位当地的电台评论家辞职，以对他们所称受到停止亲民主广播的威胁与压力做出回应。

巴基斯坦总统穆色拉夫（Gen. Pervez Musharraf）及其政府利用过激手段胁迫报道敏感题材的新闻工作者。自由撰稿人 Khawar Mehdi Rizvi 于 2003 年 12 月被捕后，一直被秘密关押至今年 1 月 24 日。巴基斯坦国营电视台不断播出所谓的新闻节目，将他描述为国家的敌人，因为他帮助两位法国新闻工作者报道塔里班在该国部落地区的活动。

在阿富汗，新闻业的情况有所改善，新闻渠道增多，新兴的独立新闻文化继续发展。在报道该国 10 月进行的首次直选中，新闻界成功的教育选民并监视选举日活动而享有声誉。但是缺乏安全与种族及文化紧张升级影响了有关报道并使新闻

工作者处于危险的境地。军阀、武装集团、安全机构与政府部门仍在威胁并骚扰新闻工作者。

但在幕后与法庭上，整个亚洲的新闻工作者还必须与更多非直接的压力斗争。例如巴基斯坦穆沙拉夫政府明显愿意削减国家给予挑战或批评其政策的出版物提供广告。在印度尼西亚与泰国，臭名昭著的刑事诽谤诉讼说明该国最近几年进行的民主改革仍有局限性。

《泰国邮报》及其三位编辑与媒体活动家 Supinya Klangnarong 被提出刑事指控与高达四亿泰铢（约一千万美元）的民事诉讼，此前该报发表了她批评电讯业巨擘 Shin 公司与该国总理他信（Thaksin Shinawatra）的关系。

在印度尼西亚，颇有影响的杂志 *Tempo* 的总编辑 Bambang Harymurti 去年 9 月被裁定犯有刑事诽谤罪并被判刑一年，其两位同事在后来被宣判无罪，起因就在于 Harymurti 在 2003 年发表一篇文章指控，一位颇有权势的商人从一次纺织品市场大火中获利。到年底时这位总编辑的上诉仍然悬而未决。

缅甸与越南的独裁政府去年与今年初释放了几位新闻工作者，但这被视为安抚性的行动，而不是言论自由政策变化的迹象。CPJ 表彰了两位被监禁的缅甸新闻工作者 Aung Pwint 和 Thaug Tun（又名 Nyein Thit），于去年 11 月给他们颁发了国际新闻奖。这两位纪录片摄制人员是在 1999 年拍摄反映农村地区强迫性劳动与痛苦生活的电影时被捕的。

位于斯里兰卡外海的岛国马尔代夫两位新闻工作者与助手 2002 年被拘留，到 2004 年底仍然被软禁，在狱中受尽了种种折磨。消息来源说，尽管总统保证进行民主改革，但他们却受到了虐待。

在韩国与台湾，新闻工作者面临更多微妙的挑战。台湾执政的民进党从金融方面加强对媒体的影响；韩国执政党提出的媒体所有权规定，仿佛倾向于惩罚保守的日报，因为他们社论的立场是反对陆武铉（Roh Moo Hyun）总统。

亚洲互联网的扩张不但挑战政府限制新闻自由的能力，而且也促进了创造性新闻形式的兴起，例如韩国成千上万“公民记者”给 Ohmynews.com 供稿。在中国与越南，互联网给每年都在发展的独立报道提供了重要的出口，使得政府的控制越来越难。

在许多亚洲国家，地方性的活动在维护新闻工作者的权益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中国促进了受监禁的新闻工作者杜导斌与程益中的释放，在巴基斯坦促进了 Munawar Mohsin 的释放。尼泊尔政府军与毛派反叛组织对当地新闻工作者态度，引起了新闻工作者的愤怒，迫使这两方面的领导人对他们的行动进行评估并保证采取额外的保护措施。菲律宾新闻工作者全国工会组织了全国性示威活动，抗议至今仍在杀害新闻工作者的行为，迫使当局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

在亚洲的许多地方，2004 年新闻界起到了有效的监督作用。例如在中国，新闻工作者揭露贪污腐化；在印度尼西亚，他们积极报道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在阿富汗，他们帮助全国性选举合法化。但当地政对此态度相当暧昧，或采取限制行动或对谋杀新闻工作者的攻击视而不见。目前亚洲新闻业的发展非常之快，其速度超过了许多保护和帮助他们的机构。

Abi Wright 是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协调人。亚洲项目研究主任 **Kristin Jones** 也参与了本节的调研与撰写。

中国（包括香港）

对于那些期望胡锦涛主席将允许中国日益以市场为导向的新闻界拥有更多自由的人来说，2004 年是令人失望的一年。2003 年接替江泽民担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去年 9 月进一步巩固其权力，在江泽民辞去最后一个领导职务之后，担任了中央军委主席。其后对媒体的镇压再次证明，政府对独立声音采取的长期钳制政策。

据 9 月 26 日中共中央全会发表证实江泽民退休的公报，官员们将“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并“进一步改进报刊、广播、电视的宣传。” 中国有 7800 万人使用互联网，政府将努力“加强互联网宣传队伍建设，形成网上正面舆论的强势。”

随着中国令人惊奇的经济繁荣，各种新型的印刷、广播与电子媒体正在萌芽。随着科技的发展与商业的成长，政府必须适应媒体的变化状态。2004 年当局增加了对手机短信的传递与数字影像广播的监视，以应付这些技术带来在全国快速传播的信息。政府还努力保持对记者与编辑的控制，因为在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他们在报道犯罪与腐败之际不断开辟新的天地。

但是，仅市场力量并不足以推动建立独立新闻。无论是外国或中国国内的私营公司，大多满足于政府的审查。同时，随着中国对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信心增加，对中国人权纪录、包括如何对待新闻工作者方面的国际外交压力也日趋减弱。中国继续是全球关押新闻工作者最多的国家，（年底时仍然有 42 位新闻工作者系狱），2004 年政府通过打击好几位著名媒体人士，进一步威胁新闻工作者。

除了为经济改革而战之外，越来越多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学者与律师在诸如农村的贫穷、非典、天安门屠杀与媒体的社会作用等关键问题上，勇敢面对中共政策的挑战。这些著名的人物成了新闻审查最大的危险，因此也成了 2004 年镇压的对象。去年底，政府甚至禁止使用“公众知识分子”来称呼那些参与公众事务的思想家。

在为新闻自由而战的过程中，中国的律师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虽然中国宪法保护新闻自由，但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媒体管理制度，新闻自由实际上却非常少。法庭通常是听上级党内官员的指示，因此给新闻自由的范围非常有限，而且法庭在禁止干扰社会主义国家与党领导方面的立法拥有较大的解说权。

律师与其它各界人士倡导民主，再加上互联网传播的作用，也许是新闻工作者杜导斌在 2003 年 10 月被捕之后判刑特别轻的原因。杜导斌是著名且受人尊重的网路作家，他被判“煽动颠覆国家罪”，部分原因是他呼吁释放被监禁、同为网路新闻工作者的刘荻。6 月 11 日，湖北一家法院以颠覆罪判决杜导斌，但暂缓执行他三年的刑期。他的律师辩护说，杜导斌只不过是行使了自己新闻自由的权利，一千多人对此表示支持，并联名致信温家宝总理。杜导斌缓刑的条件之一是不能再发表网路文章。

1 月份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发起对广州著名的日报《南方都市报》编辑的调查。2003 年一位图像设计人员据称被警察致命毒打而死，该报为报道最积极的媒体之一。此外该报还是最先报道广州 2003 年 12 月 26 日非典新病例的报纸。去年 3 月 19 日，《南方都市报》副主编喻华峰被控腐败判监禁 12 年。同一天，该报前主编李民英也因被控受贿判监禁 11 年。经 6 月上诉听证之后，他们的刑期分别被减少至八年和六年。

此外，因腐败调查被拘禁的还有该报思想独立的前总编辑程益中。当局打击这样一位著名新闻工作者的行动在中国的学者、律师、新闻工作者与政府官员中间引起了轰动。程益中于8月被无罪释放，其律师将之归功于这位编辑在国内获得的支持。但有关支持并没有保住程益中的工作。后来这位新闻工作者被开除党籍，这意味着他将不能再重操旧业。

去年秋，对新闻界的镇压进一步升级。著名网路论坛《一塌糊涂》被关闭，该论坛讨论的题材广泛，其中包括人权与民主等。外国事务杂志《战略与管理》也被关闭；其它著名新闻工作者与支持者也被骚扰、拘留或开除工作。

9月，因涉嫌“为境外提供国家秘密”，当局拘留了《纽约时报》的研究人员赵岩，这是一种最高可判死刑的罪名。当局不但没有公布有关案子的细节，而且拒绝了许多国际方面的询问。在赵岩被捕之前，当局曾骚扰并威胁他，因为他给《中国改革》杂志积极撰写有关农村问题的报道。他积极为被腐败官僚迫迁的农民说话，并到处活动帮助他们获得应有的补偿。

但逮捕赵岩最直接的借口应为《纽约时报》9月7日在官方公布之前披露江泽民退休计划的一篇文章。据国际新闻媒体报道与中国人权组织的消息，赵岩在被拘留前至少对一位朋友说，当局曾找过他，询问他是否为那篇独家报道的消息来源。

《纽约时报》“明确”表示，赵岩没有给该报提供任何国家机密。《纽约时报》还说，赵岩没有给该报作报道工作，而且也没有涉及有关江泽民退休的报道。

该逮捕被广泛视为中国政府企图阻止外国新闻工作者报道中国政治事务、并惩罚被政府长期视为眼中钉的新闻工作者而采取的行动。

拜占庭式的执照制度保证地方政府能够继续控制新闻出口。此外，各省与中央的宣传部门还经常发布针对各种题材的报道禁令。2004 年媒体对农村动乱、煤矿事故、不断涌入北京要求中央政府纠正错案上访人员的报道均受到管制。（在 9 月中共中央全会期间，成千上万的上访人员被拘留）。2004 年初，北京大学新闻学教授焦国标撰写鞭挞中宣部及其武断决定禁止报道题材的文章在互联网传播之后，他就失去了教职，有关他的报道也成了被禁止的题材。

2004 年初，政府宣布新的政策允许民间投资直接拥有报刊杂志、广播媒体与出版社的股权。这些政策并没有排除外国投资者。最近几年，媒体来自后门的民间投资与不断增加对广告的依赖迫使新的新闻出口更多的像商业实体那样运作，争取广告与发行量，而较少充当党的喉舌。甚至就连国营的出版物也得参与竞争；去年 3 月国营媒体报道，在过去的七个月，按照停止对亏损出版物提供国家资助的新措施，667 家国营报纸被关闭。

来自竞争的压力迫使记者积极追踪地方腐败、犯罪、名人丑闻与自然和环境灾难新闻。新闻工作者逐渐转变角色，充当监督人与赚钱人也使他们面临新的危险。去年 8 月，CPJ 发表了一篇有关新闻工作者因公面临暴力报复的特别报道。受犯罪与腐败调查牵连的人攻击记者的事件越来越多。但中央政府根本没有作好保护新闻工作者的准备，受到攻击的记者常常没有保护自己的权利。

报道犯罪与腐败的新闻工作者日益面临政治化的民事诽谤诉讼，以窒息他们的声音。媒体出口几乎总是没有机会打赢官司。2004 年，揭露安徽省地方腐败与官员虐待农民的书籍《中国农民调查》盗版在全中国发行了数百万本，该书作者陈

桂棣与吴春桃并没有因该书的销售而获得任何收入，但 8 月却因民事诽谤被起诉。一位在书中被点名、曾在某县长期担任县委书记的官员在该县对两位作者提出诉讼。但到年底，此案仍然悬而未决。

2004 年中国通过改善对网吧的监视系统，从而加强了对网路用户的监控。表面上采取该措施在于避免孩子接触暴力与淫秽内容，但当局也对那些允许用户传播政治上敏感信息的网吧进行惩罚。据 CPJ 调查，去年底至少有 19 位新闻工作者因为在网路上张贴评论或信息仍然在坐牢。

外国与国内的民营企业几乎没有挑战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垄断的意愿。2004 年，Google 推出了一项中文新闻服务，但却不显示被中国当局封锁的网页。受到批评后，该公司辩称，其决定符合公司避免显示不能进入其内容链接的政策。Yahoo! 也对其在中国的搜索引擎实行自我审查。其它跨国公司、包括美国的思科（Cisco）与加拿大的北方电讯（Nortel Networks）等，都为中國提供监视网路用户与过滤内容的技术。这些公司仿佛都在遵循思科 2002 年提出的一项原则。当时该公司的一位发言人对新闻周刊（Newsweek）说，“如果中国政府想监视网路用户的话，那是他们的事情。政治上我们基本是中立的。”

香港

亲民主的政治人物、新闻工作者与当地市民是香港新闻自由的最佳公益人士之一，但他们在 2004 年遭受挫败，这对当地媒体的状况带来了负面影响。不过，香港媒体仍然是该地区最自由的媒体之一。

2004 年北京加强了对香港的管制，分别禁止 2007 年与 2008 年直接选举该地区的特区首长与立法会。观察家说，这是对 2003 年抗议反颠覆立法示威的直接反应。该示威吸引 50 万抗议者走上街头，颇令人惊奇，最后导致该提案被永远搁置。但禁止直选并没有能够阻止 7 月 1 日香港从英国手中回归中国纪念日的巨大游行示威。

尽管这些反中国情绪，北京还是取得了胜利，因为在 9 月的选举中，亲民主的民主党未能在立法会获得多数席位。该结果没有反应出公众意见，因为在普选中，亲民主的候选人明显获得多数选票。在立法会的 60 个席位中，只有一半由香港市民选举；传统上亲北京的所谓功能选民，即专业人士与业界组织选择另外 30 个席位。

在选举过程中，三位受欢迎的电台主持人一个接一个很快离职，他们宣称受到威胁与压力，被要求停止亲民主的广播。私营商业电台受欢迎的晨间叩应节目《风波里的茶杯》长期主持人郑经翰 5 月 7 日辞职，称原因是受到匿名死亡威胁，与香港“令人窒息的政治气候。”在 9 月选举中获得一个席位的郑经翰以坚定不移的批评中国与由中国任命的香港特区首长董建华而著称。

数天之后，主持该台傍晚《政事有心人》节目的黄毓民也于 5 月 13 日宣布暂时休假，因为他感到“身心俱惫”。黄毓民在其广播中批评中国共产党。他后来对香港的中文周刊《壹周刊》说，亲北京的商人企图贿赂并逼他收口。5 月 19 日接替郑经翰主持《风波里的茶杯》节目、更为温和的李鹏飞也辞职。三位电台主持人相继辞职后，香港学者、新闻工作者与立法会中的民主党成员抗议新闻自由受侵蚀。

李鹏飞是香港在中国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在香港立法会表示，中国官员威胁并迫使他停止在广播中支持民主。中国政府拥有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于李鹏飞辞职之前，在一篇片评论中警告，“政治人物应对自己的言行小心谨慎。”5月19日，李辞去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职位。

虽然这一系列的辞职，但商业电台的董事俞琤否认其电台屈服于政治压力。但俞琤对记者说，10月取消《风波里的茶杯》节目，是为名为《理性与情感》的节目让路。

一些新闻工作者说，自从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避免受到中国严厉批评的压力稳定上升；当地大多数印刷与电台出口业者在中国拥有商业或政治利益。但是其它新闻工作者认为，中国对媒体的日常运作继续影响甚微。尽管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广播对谈论坛，但香港的印刷与广播出口仍然深入广泛的报道了北京试图低调对待的夏季游行示威活动，并继续刊登或者播出批评中国和地方政府的新闻或评论。

7月份，香港反腐败机构廉政署（ICAC）官员搜查了好几家报纸的办公室。在调查谁泄露了一位受保护证人姓名而进行的大规模重要调查中，官员们对新闻工作者进行了大量询问、搜查电脑，并从办公室抄走材料。

8月，香港原讼法庭作出对被搜查报纸之一《星岛日报》有利的判决，并收回了廉政署的搜查证。法官 Michael Hartmann 表示，廉政署的做法没有必要且过份。廉政署对此提出上诉，但上诉法庭以无管辖权为由拒绝。但是该法庭却公布了一个不具法律效力、但颇具说服力的声明说，廉政署的搜查是正当的。

台湾

2004 年，具有竞争性与敢于直言的台湾新闻界对政府、腐败与世界事务进行了批评性报道。台湾的新闻工作者面临极大的经济压力，对颇具争议的选举年进行高度党派性的报道引起人们对金融与政治对新闻的影响提出质疑。

数十年来，台湾的媒体处于国民党的直接控制之下。2000 年陈水扁当选总统结束了国民党不容置疑的 50 多年统治。2003 年通过、2004 年开始执行的新媒体所有权法迫使政治党派出售他们拥有的媒体股权，此举被广泛视为正面的发展。但是 CPJ 的消息来源说，这些法律在阻止民进党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方面几乎毫无作为。直到该党在 12 月的立法选举中失利之前，陈水扁一直是民进党的领导人。

9 月份，一个亲国民党的思想库公布了一个报告，指控民进党通过金融手段操纵媒体，以政府广告和政府控制的银行系统融资等嘉奖亲民进党的媒体出口。该报告还指控，民进党支持者能够担任主要广播媒体出口舵手，任人唯亲起到了作用。

10 月份，总统对电视对谈节目主持人赵少康提出民事诽谤诉讼，对有关台湾给巴拿马前总统莫丝科索（Mireya Moscoso）一百万美元的说法质疑。赵少康曾是陈水扁的政敌，此诉讼仿佛是总统惩罚其长期对手的努力。当地新闻工作者担心该案子将会产生令人不寒而栗的效果。赵少康提出反诉，但到年底该案仍然悬而未决。

新闻报道主要集中在陈水扁险胜的 3 月总统大选。临近投票前，有人企图暗杀总统与副总统吕秀莲未遂，国民党支持者指控，民进党策划了该枪击案，以获得同情票。4 月 10 日，在总统府外举行抗议陈水扁连任的示威者攻击 14 位新闻

工作者，至少一名新闻工作者，即《年代》的摄影记者黄兴浩住院。

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继续高度紧张，中国大陆视台湾为反叛省份，并一直威胁将使用武力收回。因此陈水扁政府对媒体报道军事与安全事务非常敏感，制约性的国家安全法一直存在。8月台湾高等法院维持对现已停刊的《劲报》记者洪哲政煽动暴乱罪的原判。此案源自洪哲政2000年披露一艘中国军舰在陈水扁当年宣誓就职仪式期间已进入台湾海峡的报道。洪哲政18个月的刑期后来被减少到12个月，后来是无期限缓刑。

6月份，台湾临时拒绝了给中国政府的《人民日报》派驻台北的记者颁发签证，明显是对中国拟议对台湾实行经济制裁的报复。台湾仍然禁止播放中国国家拥有的中央电视台节目，作为对中国拒绝播出台湾电视台节目的回应，台湾2003年就终止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